



因为高丰文率领的国足1989年秋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个“黑色三分钟”只差一步到罗马，继而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输给泰国，一再证明“国内练兵”作用不大。随着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，当年6月23日至27日，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举行会议，确定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，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。

1992年12月31日至1993年2月28日，“甲A锦标赛”在广东举行——这其实是一项带有实验、预演性质的比赛。当时确定，由1992年甲A联赛八支球队中的前七名，加上广东本地的甲B球队佛山队参加此项比赛。这项比赛的赛制，如今看来有点不伦不类——看上去，似赛会制，在广东一地举行；可实际上，又带有一点主客场制的元素。其中，实力最强的辽宁东药队，与广东宏远队、广州太阳神队分别坐镇广州市内的三座球场；大连华录队被分派坐镇当时的三水县；北京国安被分派坐镇当时的鹤山县；上海爱克发被分派坐镇东莞市；八一队被分派坐镇江门市；而佛山队则坐镇自己的主场佛山新广场体育场。

“甲A锦标赛”开展后，上海爱克发队主教练王后军有了新发现。他说，实践证明，通过打模拟主客场，发现中国足球也可以开发门票收入。每场进账多的能到上千元。这还是在模拟主场东莞达到的收入规模，如果回到上海，坐镇江湾体育场，这门票收入或许更为可观！而在全部赛事结束后，每队选出3名球员，共计24人，每人获得2000元优秀球员奖金。

彼时的东莞，刚撤县建市不久。

中国男足竞技水平欠佳且中国足协层面有不少负面新闻，却并不妨碍中国老百姓从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中寻求到欢乐。

许多地方还是农村，主城区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太多规划的小县城。至于江门、三水、鹤山更是如此。并且，即使这些地方之间的交通，也远没有如今这样发达。如今回忆，很难想到，中国职业体育真正起步之地，竟然是这些当年尚未完全城市化之地。一些球员的“第一桶金”也从这里得到。

中国所谓职业联赛，自1994年足球甲A联赛起步；日本的职业联赛J联赛则在此前一年启动。如今有媒体评论认为，中日足球职业化几乎是同期起步，日本足球经过职业化而突飞猛进，而中国足球与之相比，颇有南橘北枳之感。其实，这是将中日两大联赛简单对比后的结果。殊不知，中国职业联赛从1994年甲A到此后的中超，长期以来球队多依靠企业冠名赞助，及至之后企业包养。从主客场制甲A联赛初期的地方国企、乡镇企业、民企等注资，到之后汽车、信息产业、房地产企业轮番弄潮，这样的联赛本质上是伪职业联赛，其中不少球队既没有完全摆脱体工队的窠臼，更多的球队被企业包养而似企业队。其中的典型，譬如恒大——2013年恒大集团下发的“关于下发《恒大国脚八项规定》的通知”，就是一份公司内部的“红头文件”，是要抄报集团领导和集团办的。本质上，这支从广州市足球队脱胎，经历了白云山、太阳神、吉利、香雪、日

之泉、广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球队，当时已经是恒大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。

如果这也算职业化，那么，日本足球自1965年开始的全国联赛，就可以算职业化了！瞧瞧当年日本全国联赛的各队队名——古河电工、三菱重工、日产汽车……。但日本自认为从那一阶段到职业联赛之前的日本联赛为“产业联赛”。本质上，各俱乐部都是大企业包养，是企业的一部分。1988年经中国足协推荐前往日本踢球的沈祥福、吕洪祥、徐树刚，当时加盟的球队是次级联赛的富士通。1993年日本职业联赛开始时，富士通队还不是职业队。1996年，球队独立运营企业富士通川崎体育管理株式会社；1997年成为职业联赛准会员，并更名川崎前锋；1999年，川崎前锋参加首届J2联赛，之后在顶级联赛和次级联赛中沉浮，但好歹算是职业队。至于川崎前锋能否参加职业联赛，是联赛委员会来考评把关，而非日本足协说了算！

日本职业足球发展的同时，基层足球运动之普及更是如火如荼，这才是日本足协久久为功之处。高中联赛能全国电视转播——绿茵场上草皮保养之好，不输职业赛场；小球员装备之专业，特别是球衣背后印着的号码、姓名等等，看似格式与职业队大牌球星无异。《足球小将》等文化衍生品又令各地更多